

北京史专题研究

历史文化研究

吴建雍 主编

北京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北京

历史文化研究

【北京历史文化研究】



北京史专题研究

主编：吴建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史专题研究/吴建雍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2007.7

(北京历史文化研究)

ISBN 978-5402-0766-3

I. 北… II. 吴… III. 北京市—地方史—研究 IV. K2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1283 号

责任编辑: 马明仁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6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人言印刷有限公司
大 32 开本 7.5 印张 205 千字
版次: 2007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
印次: 2007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-5402-0766-3

全套定价: 150.00 元

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丛书

(北京史部分)

第一册：整合北京山区历史文化资源研究（主编：戚本超）

第二册：永定河历史文化研究（主编：吴文涛）

第三册：北京风俗史研究（主编：袁懋桢）

第四册：北京史专题研究（主编：吴建雍）

编委会特邀顾问：刘牧雨

编委会主任：王 岗

编委会委员：李宝臣、孙冬虎、袁 熹、吴文涛、郑永华、
刘仲华、赵雅丽

特邀编委：尹钧科、王灿炽、吴建雍、高尔强、郭增玮（以姓氏为序）

第一册责任编委：李宝臣、郑永华

第二册责任编委：王灿炽、王 岗

第三册责任编委：尹钧科、刘仲华

第四册责任编委：孙冬虎、吴文涛

目 录

北京佛教史研究专题:

燕地佛教之始兴述略·····	1
宣南地区的辽金寺庙与碑刻·····	16
关于元大都藏传佛教的两个问题·····	28

北京对外贸易史研究专题:

元代大都的对外贸易·····	44
明清时期北京的对外贸易·····	51
民国时期北平的对外贸易·····	70

清代北京宗教民俗研究专题:

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宗教民俗的社会功能试探·····	85
清代推行教化与治理民间教门之关系试探·····	100

北京基督教传教史研究专题:

清代中前期北京的天主教士·····	115
1843 - 1900 年在京天主教遣使会传教活动的恢复与发展·····	128
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冲突的根源与意义·····	145

其它北京史研究相关专题:

北京什刹海地区的清代宗室王公府第·····	153
袁中道笔下的明末北京地理环境·····	172
北京近代书业经营方式及特点分析·····	185
清末民初北京服饰的变化研究·····	197
漕运对通州经济的影响·····	215

附录:

“朝阳区体育设施与人文奥运”调研报告·····	22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燕地佛教之始兴述略

王 岗

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，源自西土。秦汉以来，始向东传，达于中原。初建寺宇于都邑，以传其法；继译梵典为经藏，而树其宗。蕃衍渐广，信奉者众。魏晋南北朝时，政局纷乱，争战连年，而佛教蔓延之势不衰，自中原扩展到江南。南朝行之未久，即趋大盛，其势反而更甚于北方。隋、唐一统天下，东、西二京，佛法复炽。边塞之域，亦已遍及。通都大邑，僻地村落，靡不建寺。达官显贵，农工商贩，尽皆敬佛。遂与儒、道二教分庭抗礼，而成鼎足之势。金末人曾评之曰：“佛法之入中国，至梁而后大，至唐而后固。寺无定区，僧无限员，四方万里，根结盘互。地穷天下之选，寺当民居之半。而其传特未空也。”^{〔1〕}

北京地区，北据群山，南带平原，自西周封藩，即为北疆重镇，燕为七雄之一，立国数百年。秦、汉设郡，置以重兵。至于唐代，其势愈重，藩镇居于北方之首。然而，因其地处边陲，文化之发展，较为缓慢。佛教之传播与发展，亦未能与中原及江南同步。就全国范围而言，汉、魏为始传期，南北朝为确立期，隋、唐以至宋、元，为兴盛期。而到明、清，则为由盛转衰期。就北京地区而言。唐五代以前，尚处于初兴阶段。历辽、金、元三代，始有进一步发展。至明、清方趋于繁盛。清末民初，乃日趋衰落。

就佛教发展之范围及时间而论。燕地佛教之传入，即较中原为晚。印度僧人初入中原，传播佛法，即立足于交通发达的东都洛阳。并以此为中心，向四面扩展。而其主要发展方向，一是向南，一是向西。向南乃因风俗民情所致。自荆楚以至吴越各地，其民多信奉巫觋、神灵，故而佛教易于传播。向西则因西都长安为全国政治中心，兼之文化较为发达，影响面广，亦有利于佛教之传播。故

而自汉至唐的数百年间，江北以河洛、关陕、三晋等地，江南以荆楚、吴越等地佛法为盛。北方佛教，至晋代，始向东、向北传播。其发展顺序，仍以洛阳为中心，向东为徐淮、以至齐鲁各地，向北为赵魏，以至于燕冀。燕地乃为中原佛教发展之最边缘。

就佛教发展之层次而论，燕地亦远逊于中原各地。佛法之传播，必借助于权贵之崇奉与倡导，然后民众方能向风而化。故其发展层次，必先据京城，以求帝王及将相权贵之崇奉，而后扩展至各大自然区域的城市。再其次，才发展到一般城镇，以至于较为富庶的村落。最后，则穷乡僻壤，尽皆被及。北方自汉至唐，两京为都之时最久，故其佛教发展最早，势力最盛，其发展层次也最深。到北朝时，除长安（今西安）、洛阳（今洛阳）外，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、邺城（今河南安阳），亦曾作为都城，故而佛教发展，也盛极一时。燕地之中心城市，首推幽州（今北京），亦为本地区佛教传播与发展之中心。而其发展层次，则又逊于东西二京及平城、邺城等处。

佛法所传，必借寺宇，以处其僧众。故洛阳首建白马寺，此后，凡佛法所到之处，僧人皆以创建梵刹为急务。燕地自晋代佛教传人，亦立有寺庙。其年代最久远者，传为潭柘寺。其寺位于幽州马鞍山之西，晋代称嘉福寺，至唐代改称龙泉寺，金代又称万寿寺，清代康熙帝敕赐寺额曰：“岫云禅寺”。而历代则通称为潭柘寺，燕人谚曰：“先有潭柘寺，后有幽州城。”即指此，以喻其历年久远。燕地寺庙，有创建时间可考者，始于北魏。共有三寺。其一，为奉福寺。建于幽州城里，“按旧《记》，寺起于后魏孝文之世，为院百有二十区。后罹兵烬。”时当公元五世纪下半叶，其规模之宏大，应为幽州诸寺之冠，金代曹谦所撰《圣像功德碑记》亦云：“都城之内，招提阊若如棋布星列，……独奉福基于后魏，历唐及辽，以迄于金，比他寺为最古。”⁽²⁾其二，为光林寺。建于幽州城郊，亦为北魏孝文帝时所造，“依峰带涧，面势高敞”，隋代改名宏业寺，曾于文帝时受命安置佛舍利，建佛塔。⁽³⁾由此可见，该寺在燕地亦有较高声望。其三，为尉使君寺。乃东魏元年（538

年)幽州刺史尉长命所造,隋代改称智泉寺,亦曾受命建佛塔,安置舍利。至唐代,武则天称帝时,命改为大云寺。玄宗开元年间,复改称龙兴寺。文宗太和八年(854年)八月,寺遭火焚,遂废毁。

(4)

晋代佛教始传入燕地,影响甚微,信奉者少,故其建寺亦少。北朝各代,以北魏立国最久,自道武帝崇佛,中经太武帝灭法,佛教一度受挫,其后文成帝又重兴之,至孝文帝太和元年(477年),佛教在北方已较为普及,各地僧尼已达七万七千多人。仅都城平城(今山西大同),即有新、旧寺庙近百所,僧尼二千余人。燕地奉福、光林等寺之兴建,亦为此时期。其后,历东魏、北齐、北周,以至于隋代,诸帝虽多崇奉佛法,然因国祚颇短,战乱相仍,又加上道教的势力起而与其相抗衡,乃影响到燕地,使得寺庙的建造亦较少,仅有白马寺、智泉寺、大安寺等数所而已。

燕地开始普遍建寺,始于唐代。唐初,太宗崇奉佛教,广集名僧于两京,翻译和整理佛经,为佛教义理的进一步普及和深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,佛教的传播更为广泛。是时,燕地所建著名寺院,有淤泥寺(后称鹫峰寺)、北留寺、马鞍山慧聚寺(后称戒坛万寿寺)、白带山云居寺及蓟州白岩寺等。武则天为登基称帝,亦利用佛教的影响,伪造《大云经》,并在全国各地广建大云寺。是时,燕地除名刹智泉寺被改称大云寺外,又先后建有数座大云寺。而著名的悯忠寺,亦为此时所建。

唐代中期国力强盛,佛教发展亦趋于极盛。燕地所建佛寺,亦不少。著名者如天王寺(即今天宁寺)、千像寺(又称枯唐寺)、归义寺、真应寺、崇孝寺,以及涿县之龙泉寺、潞县(今北京通县)之净业寺等,皆是。此时,燕地之寺庙创建,已开始由州郡向所属县镇扩展。到唐代后期,这种扩展趋势更加明显。除幽州城内,新创胜果寺、宝集寺、金阁寺、清胜寺、佑圣寺等庙宇外,四郊州县所建还有:平谷之兴善寺、固安之冲相寺、潞县之林泉寺、昌平之昭圣寺,以及蓟州盘山之甘泉普济寺、上方寺、天成寺、云罩寺、香水寺、金山寺等,皆为一方之名刹。仅据零散资料所载,

有唐一代，燕地所建寺庙，即多达六十余所。从一个侧面表现出燕地佛教的发展；已经开始趋向于兴盛。

北朝时期，燕地佛教初起，僧侣远较洛阳、平城、邺城等都会为少，其著称于世者，更是寥寥。然仍有卓然不群，扬名于全国佛教界而毫不逊色者。如释昙无竭即是。昙无竭为幽州（今北京）人，自幼出家为僧，修行勤苦，为同门所敬重。“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，乃慨然有忘身之誓。”遂于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（420年），与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，“发迹北土，远适西方”，所行为西北一线，“初至河南国，仍出海西郡，进入流沙，到高昌郡，经历龟兹、沙勒诸国，登葱岭，度雪山，障气千重，层冰万里。”历尽千难万险，遂达西土印度。“进至罽宾国，礼拜佛钵。”并在此停留一年多，学习梵文、梵语，又获得梵文《观世音受记经》一部，然后继续西行，至月氏国，“礼拜佛肉髻骨”。继至檀特山南之石留寺，并在此受大戒，停留三月，杂学三乘佛法。同行二十五人，只剩十三人。此后，又向中天竺界进发。路途更加险恶，曾受山象、野牛的袭击，幸免于难。而同行十三人中，又有八人死于途中。昙无竭等人后经舍卫国，渡恒河，至南天竺。终于完成了西行的壮举，坐海船回归广州。回国后，又将所获之《观世音受记经》译为汉文，广为流传。^{〔5〕}昙无竭的西游佛国，比唐代著名的玄奘取经，还要早二百余年。

北朝时期，燕地佛学比较落后，故而许多僧人，都出外求学，从而显名中夏。其中，又以释宝儒、智梵、靖嵩等人最有名。宝儒为幽州（今北京）人，自幼出家，到处求学佛法，“游博诸讲，居无常准，惟道是务。”^{〔6〕}后至佛学发达的邺都，拜南道地论名僧慧远为师，从学《十地经论》，“颇知纲领”。适逢北周武帝灭佛法，逃往江南。隋统一天下，重弘佛法，复归洛京，仍从慧远学习《涅槃经》，深得要领，后传法于西京（今西安）静影道场。

智梵（539—613）为涿郡良乡县（今北京房山区）人，年十二，即出外求法，于河间郡拜灵简为师，得剃度，“遂游学邺都，师承《大论》、《十地》等文。”后西游关中以传法，至隋开皇年

间，名声渐起，“大行道化，信靡如风”。仁寿末年，重归邺城传法，“学侣云随，开帙剖文，皆传义旨”。⁽⁷⁾后奉旨，住西京禅定道场，坐化于此。

靖嵩（537—614）为涿郡固安县（今河北固安）人，北齐初年，出家为僧，曾向同门师兄弟靖融学习佛法。靖融“早达经论，通该小，大，尤究《杂心》，每以佛宗深要，曲流委示。”靖嵩凡遇不懂处，亦随时请教，“融无以对也，乃告曰：……可往京邺，必成济器。”靖嵩成年后，遂南下求学，“属高齐之盛，佛教中兴，都下大寺，略记四千；见住僧、尼，仅将八万。讲席相距，二百有余。”为靖嵩精研佛法创造了极为良好的环境。他先向大学寺的融智法师学习《涅槃》、《地论》等大乘经典，又向道云、道晖二名僧学习《四分律》戒仪。复向毗昙、成实名师道猷、法诞学习《杂心论》、《成实论》等小乘经典。由是佛法日精，名声大振，“势倾八位，词号四飞，独步河山，舟航三藏。”遂开席传法，“每于肇春，广延学侣，大集邺都，特开法座，奉嵩为法主。”⁽⁸⁾此后不久，北周武帝灭齐，又排毁佛法，靖嵩遂与众僧三百余人逃往江南，受到陈宣帝欢迎，并下敕，“宜于都郭大寺安置，所司供给，务令周洽。”隋平天下，靖嵩等闻文帝复兴佛教，遂渡江北归，至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，再传佛法，“自此领匠九州，垂章四海”，遂成一代佛学大宗师。所著有《摄论疏》六卷、《杂心疏》五卷，以及九识、三藏、三聚戒、二生死等《玄义》，并传于世。

北朝时，燕地僧侣多因求学佛法而南下。与此同时，洛阳、邺京等地佛教学派亦不断向北扩展，直接影响到燕地佛教的发展。其中，又以慧光所传南道地论派一系的影响最大。其亲传弟子灵询，即为燕地之渔阳（今北京）人，年幼出家，初学《成实论》及《涅槃经》，并深有研究，着《成实论删要》两卷，“注而释之，盛行于世”。后因景仰慧光，尽弃旧学，而改学《地论》，“晓夕研寻，十有余载，纤旨秘教，备知通塞。”至东魏时，曾回燕地传其学说，“游历燕赵，化露四众，邪正分焉”。⁽⁹⁾后任国都、僧统等僧官。慧光的另一弟子昙遵，亲从受戒度，就学十余年“大乘顿

教，法界心源，并披析义理，挺超时匠。”始传佛法，“化行洛下，流演齐、楚、晋、魏，乃至燕、赵。”^{〔10〕}此后，亦曾任国都、僧统等僧官。昙遵之同门师兄弟，又有昙衍（502—581），于北魏孝明帝正光末年投到慧光门下，学佛法数年而有成，“由是讲事无废，昆赞玄理，声辩雄亮，言会时机。自齐、郑、燕、赵，皆履神化。……常随义学，千僧有余。出家居士，近于五百。”^{〔11〕}

又如四分律宗一派，亦对燕地佛学产生一定影响。北魏中期，名僧道覆着《四分律疏》六卷，弘扬戒律。其徒有释昙隐，自幼“崇奉戒约，诵习群经”，“归宗道覆，而听律部，精励弥久。”其后，因慧光亦作《四分律疏》，更就学之，“遂为光部之大弟子也。”并以戒律之学闻名当世，“乃超步京邨，北悟燕赵”。^{〔12〕}影响之远，亦达于燕地。

时又有名僧亲至燕地传法者，为灵裕。灵裕（517—605）于北魏末年出家，初从慧光之弟子道凭、昙隐、法上等人学《地论》之法。其后，“又从安、游、荣等三师听《杂心》义，嵩、林二师学《成实论》。”“由此邨下擅名，遐迩驰誉”。北齐中，“范阳卢氏，闻风远请，”灵裕遂至燕地，弘传佛法，“至止讲供，常溢千人。听徒嘉庆，前后重迭”，影响极大。^{〔13〕}不久，复归邨都，遭北周灭佛，“乃潜行世壤”。隋代再兴佛教，灵裕又到燕地传法，“乃潜游燕赵，五年行化，道振两河。”为恢复和发展燕地佛教而尽力。后受隋文帝之召，住西京兴善寺。因固辞国统之职，归隐于相州演空寺。

到了唐代，燕地之佛学，仍落后于东西二京及江南等地。故而有志钻研佛学的燕地僧人，亦多南下求法。如释幽玄、常遇、道膺等人即是。幽玄为幽州（今北京）人，自幼崇佛，成年后，出走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，拜贤禅师出家。至宪宗元和二年（807年），又出游江南，弘传佛法。常遇（817—888）为范阳人，“出家于燕北安集寺”。宣宗大中四年（850），遂出游求学佛法，遍历佛教诸胜地。至五峰山华严寺，燃指以奉文殊菩萨。后至西台清凉山秘魔岩，遂创建梵刹，以传佛法，闻名于时。

道膺为蓟州玉田（今河北玉田）人，自幼即曾诵习佛经。年二十五，“方于范阳延寿寺具足戒。”初学律宗之戒仪等，颇为繁琐，“膺叹曰：‘大丈夫可为桎梏所拘邪！’由是拥线衲，振锡环，萃翠微山问道。”^{〔14〕}其后，遇南方僧人北上者，“盛称洞上禅师言要”，道膺遂南下以求学于禅宗之曹洞一系，深得其要领，于是在云居山开法传道，为曹洞宗之著名禅师之一。历三十年，“所化之徒，寒暑相交，不下一千余众。”

唐代燕地僧人，遍游佛教胜地，弘扬佛法，最着称者，首推释义净。义净（635—713）为范阳（今河北涿州市）人，自幼即精通佛法，并仰慕法显、玄奘之高行，立志要西游佛国。高宗咸亨二年（671年），始出行，所经为南方海道一线。由番禺（今广州）坐海船出发，“鹭峰、鸡足，咸遂周游；鹿苑、祇林，并皆瞻瞩，诸有圣迹，毕得追寻。经二十五年，历三十余国。”^{〔15〕}饱经患难，获梵本经、律、论约四万部，然后回国。证圣元年（695年）夏，抵达洛京，受到武则天的亲自欢迎。此后，专门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，一生共译《华严经》、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、《孔雀王经》、《一切庄严王经》等佛经107部，428卷。为我国著名的译经名僧，后人称其可与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、不空等名师并驾齐驱，对中国佛教的发展，产生重要的影响。义净又撰有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、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等五部重要著作，流行于世。

至唐末五代，燕地僧侣南下求学佛法者仍不少见。如释可止、僧照、智江、师律等即是。可止（860—934）为苑阳大房山（今北京房山）高丘人。年仅十二，即到幽州名刹悯忠寺，投在法贞律师名下。年十五，又南下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，于华严寺仁楚法师门下，学习《因明论》，师评其“温故知新，历精弗懈。”年十九，至五台山受戒。尔后重返燕京，探望父母及法贞律师，并于悯忠寺弘扬所学佛法。四年后，又出行，“往并部习《法华经》、《百法论》。”后至长安（今西安）讲法，于干宁三年（896年），受到唐昭宗的召见，并赐紫袈裟。燕帅刘仁恭亦闻其名，“移书召归故乡”，复传法于燕地。其后不久，后唐庄宗出兵伐燕，俘刘氏父

子，可止避兵出走，死于洛京。

僧照（879—948）同为范阳人，年幼时也出家于幽州悯忠寺，学习佛法十分刻苦，“暗诵经典，已逾六大部矣，即《最胜王》、《大悲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法华》等经。傍加听寻经论，十数年间，深文伏义，蓝出青矣。”^{〔16〕}至唐末，遂南游于中山、洛阳等地，后至洛京法林院，主讲《法华经》，“平昔讲凡七十余座”，大众向化，并受赐紫、加法号等，为一时名僧。

智江（885—958）为幽州三河（今河北三河）人，年十五岁，出家于蓟州盘山感化寺。唐天复三年（903年），至五台山梨园寺，“纳木叉法”，又习《净名》、《上生》二典，得其精要，遂着《瑞应钞》八卷，广传于世。师律（884—964）为范阳人，年十五，出家于幽州悯忠寺，拜贞涉为师，令其游方学法。师律奉命南下，学习禅宗之法。后梁时，回幽州弘扬禅宗之法。到后周时，又于夷门山弘扬佛教，“朝廷以紫衣、徽号，用旌厥德。”^{〔17〕}至宋初，死于汴京。其它如受具足戒于幽州宝刹寺之师会，出家于幽州驻跸寺之恒超，都曾于外地弘扬佛法。

唐代弘法于燕地的著名僧侣，唐初有智嘉禅师，华严禅师，唐中期有真性律师、宝积禅师，唐后期则有道宗大师、晓方禅师。智嘉为燕地之玉田（今河北玉田）人，自幼慕向佛法，“恒诵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洞究厥旨。”^{〔18〕}其后遍游名山胜地，至蓟州（今河北蓟县）东之葛山，见有废刹故基，及“龙福院”之旧额，决定于此传法建寺，“由是远近归向，布施惟恐其后，乃因旧址，为起殿庑，俄成宝坊。”重修之龙福寺，遂成为蓟州一大名刹。

武则天时代，又有华严和尚，居于幽州（今北京）城北，“恒持《华严经》以为净业。……其所诵时，一城皆闻之，如在庭庑之下。”^{〔19〕}由此名闻于燕地，并受到时任幽州都督的张仁愿敬礼，出资施舍于马鞍山竹林寺。此后，华严和尚“行化既久，及终坐亡，肉身不萎败”，遂被京西名刹潭柘寺奉为开山第一代祖师^{〔20〕}。

真性律师（752—835）为涿郡范阳（今河北涿州）人，白带山云居寺著名律学大师，“潜趣真宗，知至道之可乐；精修梵行，既端

清而秉志。……律风辉振前古，万行由兹滋起。”^{〔21〕}因其精修戒行，受到合寺；僧众的拥戴，出任寺纲，“共乐推诚，咸称悦服”。于是广集资财，扩建寺舍，“佛宇益崇，常住滋赡”。又另创立有别院一所，请燕地名僧“转藏经七遍”。由此名声大振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，“奇香异药，上服名衣，使命往来，难可称计”。死后起舍利塔于寺旁。其入室弟子七人，为仲说、恒智、鉴直、惠增、志千、文辰、宝定。其中，惠增自得其亲传后，出游京师，“曾于荐福寺讲《大花严经》，声振洪都，艺交清级。”（同前）另两位弟子鉴直、志千，“业擅小乘，学游多地。尽得南山之要，皆扬东塔之能。”亦为律学名僧。

宝积禅师曾就学于禅宗名僧道一，得其印可，遂至蓟州盘山传扬其法。“有十人上山，九人得道之语”。所建有云罩寺，在盘山之巔，又曾至涿州，于大安山建香光寺，以传其法。死后，两处寺院皆建佛塔以存其舍利。宝积有高徒名普化，“躬事盘山积禅师，密密指教，深入堂奥。”^{〔22〕}此后，四出游荡，因其言行颇怪诞（曾对临济玄公学驴叫），故而受到贬抑，被有关的著述排在“散圣科目”中。

道宗（795—866）为唐光禄卿田宾庭后人，于元和九年（814年）在幽州名刹金阁寺受戒，后“礼志敬寺如琳为师”，又拜在永泰大师门下。受其指点，至蓟州盘山建寺传法。”初传乡里，渐达州郡，千里风闻，四众云集。”社会影响越来越大。连燕地军政要员张仲武、张允伸等人，亦“遥瞻道德，渴想音徽”，“远钦道行，频驰清奉”，对其优礼有加。死后，并为其立碑、建塔。^{〔23〕}

是时又有晓方禅师（794—870），苏州常熟（今江苏常熟）人，初师五泄山灵默大师，后于太和年间（827—835）至盘山宣扬佛法。“不师文字，上天烧尾，别创风雷”，遂建甘泉普济寺，并受到地方官吏的崇奉，“方岳公侯，连城守宰，偃风渴道，靡不皈依。”^{〔24〕}亦在燕地造成极大影响。

到唐末五代，又有从实禅师，于古刹潭柘寺弘扬佛教，其法大盛。“师与其徒千人讲法，潭柘宗风大振。后示寂华严祖堂，建塔山

中。”⁽²⁵⁾ 为中兴潭柘寺之佛学而尽力。

唐代燕地僧人能在佛学研究中有成就者，首推释道辩。道辩为范阳（今河北涿州）人，“天性疏朗，才术高世。……剖定邪正，开释封滞，是所长也。”曾先后在五台山、洛阳等佛教活动中、心学习，传扬佛法。曾立志遍注众佛经，后未果，“但注《维摩》、《胜鬘》、《金刚》、《般若》、《小乘义章》六卷、《大乘义》五十章，及《中玄照》等行世。”⁽²⁶⁾ 对唐代佛教学术的发展，产生一定影响。

在唐代，虽然有许多燕地僧人南下求学，于各地弘传佛法。同时，也有一些外地僧人，开始至燕地佛寺受具戒，学佛法。除上文提及的名僧道宗，曾在幽州金阁寺受戒外，又有释义存、从审等人，亦曾至燕受戒。义存为泉州（今福建泉州）人，曾在芙蓉山落发出家。至唐宣宗时，“北游吴楚、梁宋、燕秦。受具足戒于幽州宝刹寺。”此后遍访名山，以学禅宗之法。而从审自幼于江都；（今江苏扬州）禅智寺出家，后于懿宗咸通五年（864年）到燕地，“受具戒于燕台奉福寺。”是时，该寺为著名律宗寺院，从审遂于此学习戒律，“律席经筵，遍知尝染。”⁽²⁷⁾ 学成后，复归故乡，弘扬所学，成为当时名僧。

在唐代，又多有外地僧人，北至燕地，开山传法。除上文提及晓方禅师外，又有遵公禅师，于咸通年间（860—874），自襄阳（今湖北襄阳）至燕，弘传禅宗之法，住于延洪寺，“开废殿而创尊容，辟虚堂而兴法席。”遂使废刹重兴，为唐末燕地之名刹。更有自外国远道而来，弘法于燕地者，为普照禅师。乃“西方吐火罗国人”。于德宗时至燕，在幽州城东创建佛寺，贞元初年（785年）赐寺额为“宝刹”。“佛宫僧舍，几至千室”。其规模之宏大，亦为燕地所罕见。

燕地佛教的发展，必然要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宗教政策的影响。而历代统治者又大多崇奉佛教，并利用其作为工具，以巩固统治。然而，亦有个别统治者，出于种种原因，而一度打击、排毁佛教。自晋至唐五代，北方地区出现过四次较大规模的“灭佛”事件，

即所谓的“三武一宗”灭佛。

第一次灭佛，始于北魏。太武帝因受到道教人士寇谦之、权臣崔浩等人的影响，于太延四年（438年）下令，命五十岁以下的僧人，还俗充军。到太平真君七年（446年），又因听信崔浩之言，以为僧人参预了盖吴的叛乱，遂下令，尽杀长安城中之僧侣，并在全国废除佛教，焚毁经典、佛像。因是时燕地佛教初传入，尚未普及，故而影响甚微。

第二次灭佛，是在北周武帝时。是时，武帝崇尚儒学，再加上道士们的挑拨，于是在京城集三教领袖人物，相互论辩，以定其优劣、高低。经过七次大规模的辩论会，最后定为：儒教最高，道教次之，而佛教最低。不久，攻灭北齐，武帝遂下令，尽灭齐地佛教。寺庙皆赐与王公贵人，以作宅第，僧侣尽为编户齐民，以应差徭。由于燕地适属齐境，佛教遂受到较大打击。如东魏时所建之延寿寺，应即毁于北周灭法之时。至隋代，才又兴复。

第三次灭佛，是在唐代会昌年间。因武宗喜好道教，受道士赵归真，及权臣李德裕等人的影响，遂下令排毁佛教。自会昌二年到五年（842—845），全国陆续拆毁大、小寺院四万四千余所，僧、尼被迫还俗者多达二十六万余人，没收寺田数千万顷。是时，燕地佛教所遭打击亦极大。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所辖八州之内，奉敕仅留名利悯忠寺一所，余寺皆被废毁。所留僧侣仅有十人，余皆被迫还俗。而佛教胜地五台山的僧众，因受灭佛影响，多逃奔幽州。张仲武竟封二刀，命居庸关守卒，“有游僧入境则斩之”，可见是时禁佛之令甚严。武宗死后，唐宣宗复崇佛教，燕地的佛教得以不断恢复和进一步发展。

后周世宗即位后，立即采取打击佛教的政策，开始第四次大规模的“灭法”活动。共裁减境内佛寺三千六百余所，并下令削减僧、尼数量，销毁各地铜佛像，用以铸钱。然是时，燕地已被北方少数民族强国契丹所占，故而未受其“灭佛”之影响。与此相反，中原各地僧侣，由于灭佛运动之所迫，必然要逃往江南及燕地。这正好会促进燕地佛教的发展。